



12月4日晚，由欧阳黔森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改编的28集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高热收官。该剧从11月12日首播以来呈现出“高开高走”的强劲态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收视率统计系统——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显示，电视剧《乌蒙深处》播出期间收视率每日位列第一，最高峰值到2.83%；芒果站内播放达13.1亿次，登陆站内热搜榜TOP2；猫眼全热度全网曝光累计超6.11亿次。播出期间，共收获全网热搜110个。抖音乌蒙深处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超24亿次，高赞视频带动剧集曝光，持续提升剧集热度，获得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

《乌蒙深处》是文学改编影视的一个范例



鲍坚，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作品有散文《正是看花时节》，长篇小说《仰仰之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明月关山》。其中《雪山大地》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正是看花时节》获第一届白马湖散文奖优秀奖散文奖。

文学作品成为影视改编的源头活水

在中国影视发展史上，文学作品是影视剧改编的一座“富矿”。在贵州，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的案例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如山根据贵州作家石果的小说《风波》改编为电影《一场风波》，贵州农村风貌首次被搬上银幕。

1978年，由贵州作家蔡葵担任主要编剧的贵州第一部彩色电影故事片《山寨火种》，问鼎中国电影“百花奖”，荣获了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等11个奖项提名，被载入贵州电影史。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贵州影视艺术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时期。

以写小说蜚声文坛的贵州作家李宽定当时颇具影响力，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良家妇女》《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山雀儿》等，构成了一个系列，以一定的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成为贵州文学作品改编影视的一段高光历史。

198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我省作家袁浪的中篇小说《古楼侠影》改编成电影《血藏秋风楼》，该影片名列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拷贝发行首位。1993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自袁浪小说《魂断扬州路》的电影《无名三侠客》热映全国，该片获伊朗曙光旬国际电影节大奖。这两部电影的编创均由袁浪操刀。

进入新时代以来，贵州文学创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文学黔军”。

这支队伍以欧阳黔森、肖勤、肖江虹等为代表，不断推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文学作品被电影电视剧制片公司搬上银幕，在国内外均取得了一定口碑。

欧阳黔森成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根据他创作的多部文学作品改编并由他编剧和任总制片人的电视连续剧、电影有《二十四道拐》《花繁叶茂》《伟大的转折》《沸腾的群山》等15部，曾四次获得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得全国电视“金鹰奖”，三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其中《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奢香夫人》每部作品都获得了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金鹰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三个国家级大奖，这三部作品均由欧阳黔森创作的小说改编。此外，其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改编的电视剧《乌蒙深处》版权将翻译成12个语种，彰显贵州故事的吸引力。

“以创作主导权挖掘更多贵州故事。”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说，如今贵州影视产业在不断升级迭代，未来还将有更多“黔字号”作品出现，全面展示贵州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发展之美，通过贵州的影视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深扎本土创作回归内容为王

贵州文学为何能持续地向影视转化？答案在于深扎的创作态度与扎实的专业功底、敏锐的艺术眼光和紧密的团队合作，缺一不可。

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的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编的难度往往不亚于重新创作。因此，如何平衡好剧作与原著的关系，在保留原著精气神的同时实现艺术载体的转化，成为改编成功的关键。

据了解，当前80%的影视剧作品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原创性影视剧本的占比只有20%。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李俊坦言，就改编而言，文学原著已将作家对生活的感悟摆在我们面前，需要编剧慧眼识珠，取其精华。

“剧本必须为未来的影视剧提供一个坚实的文学基础，即较高的文学性，要做到‘三好’即好故事、好人物、好主题。已出版的文学作品，经历了编辑、专家的筛选鉴定和读者的市场检验，故事、人物、主题是立得起来的，不同程度地达到了‘三

好’。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改编的电视剧《乌蒙深处》获得成功，再一次彰显了文学作品影视转化的魅力。”李俊说。

谈到如何把握改编尺度，李俊认为，改编的工作不是改，而是留。原著与改编作品应当是一种“对话”关系，优秀的改编作品就是在“对话”中碰撞出火花的“双响炮”。根据石永言的报告文学《遵义会议纪实》改编的电视剧《遵义会议》，获得1997年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根据肖江虹的中篇小说《百鸟朝凤》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2013年的“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2014年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

文学作品改编之后搬上荧屏，实际是观众期待影视产品回归内容为王。

由肖勤小说《廖廓塔唱合唱团》改编的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今年在从江县完成拍摄，预计明年在院线上映。“廖廓塔佩”苗语意为“勇敢的女孩”，电影也在故事的原型地取景。“2022年的一次从江之行，接触到了许多对未来充满梦想的女孩，于是产生了写一部反映贵州苗乡侗寨女孩子们绚丽梦想的小说。”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肖勤说。

这些有着贵州印记的影视作品，均以贵州素材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叙事角度注重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在荧幕上构建起一个立体而迷人的贵州。

“取景地”助推当地发展

从1986版《西游记》带动黄果树瀑布水帘洞被全国熟知，到《路边野餐》让凯里弥漫文艺气息，《无名之辈》《长夜将尽》展现贵州城市生活的烟火气，再到《庆余年》《星汉灿烂》等古装巨制的频繁取景，《沸腾的群山》《花繁叶茂》《绝地逢生》等多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先后登上央视等主流平台，不断拓宽文学边界，释放贵州魅力。

贵州影视从“取景地宣传”的1.0时代，不断跃升为“内容赋能、业态融合、品牌打造”的3.0时代。“以都匀秦汉影视城为例，自2017年以来，依托影视文化产业带动地区影视综合产值135亿元。”贵州匀影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宏说。

随着电视剧《乌蒙深处》的热播，再次掀起到贵州打卡的热潮，乌蒙山关键词搜索激增320%，毕节和六盘水等地酒店预订量上涨45%以上。赫章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威宁草海等景点一夜之间冲上贵州小目的地排行榜前5，旅游攻略阅读量增长5倍。

文旅产业也乘上改编剧集的东风。随着文化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不少精品好剧成为展现地方特色、彰显风土人情的文旅新名片。

“电视剧就像是旅游前的‘预习功课’，让我能更好地探索目的地的人情味与烟火气。”喜爱观剧的“00后”杨子函说道。

2024年，毕节市黔西市化屋村旅游综合性收益达16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典范，与电视剧《乌蒙深处》原著《莫道君行早》所讲述的故事高度契合，成为电视剧的主要取景地。

“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电视剧《乌蒙深处》编剧欧阳黔森表示，剧中的“悬崖村”并非特指某一村落，而是贵州山区村落的统称；角色也不是单个体的复刻，而是将多个真实人物的特质融合后的典型化处理。“要让观众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家乡的影子，因为实际上，有无数个‘悬崖村’的故事正在贵州、甚至全国各地发生。”

当前，贵州正在组织以“四大文化工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推动“影视+文旅”融合发展。电影《四渡》《二十四道拐》《阳明悟道》等，电视剧《阳明传》《月从江下生》《大明长风》等一批呈现新时代贵州风貌、反映新时代贵州精神的影视佳作将陆续出炉，向大众讲述贵州故事，展现贵州风采。

山清水秀的地方，但贵州的山水自有独特的迷人之处，还有少数民族保留着非常生动鲜活有趣的生活方式。《乌蒙深处》把贵州的地域性特征展现得非常鲜明，这些对于没去过贵州或了解不深的人来说，都非常值得向往。”

在鲍坚看来，这些青山秀水之地在改变山乡面貌的过程中，必然花费了巨大努力，取得的成效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区域特色、文化特色，都能讲出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背后有一个共通的内核。中国人凭借辛勤努力和志向，改变小我、改变小区域，汇集起来就是改变大我、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他表示，进入新时代，这种变化有目共睹，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

“影视改编是让文学精品中反映的精神被更多人看到的重要渠道和展示形式。”鲍坚认为，“中国作协启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文学界重要的创作项目，目前已出版18部文学精品。《莫道君行早》作为该计划中率先实现改编并播出的作品，对于其他作品的影视改编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也让我们更有信心与作家及相关方面共同进一步推进作品的转化。”

“作品中反映出的山乡人改变山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谈及观看《乌蒙深处》的感受时，鲍坚表示。



滇黔通道咽喉关索岭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坝陵河大桥如飞虹一道，越过山高水深的坝陵河峡谷。就在离它不远的峡谷深处，已然坍塌断裂的老坝陵桥在两岸留下桥墩。相机对准断桥，后方气贯长虹的坝陵河大桥跑来“抢镜头”，过去和现在同框呈现。

关索岭古道的一端就在坝陵河峡谷谷底的西侧，沿着古道翻过关索岭，就进入关岭县城。从今天的安顺关岭过晴隆，到盘州，过胜境关，进云南，是古时滇黔两地的重要通道。元代这条通道从湖广通往云南的“普安道”的组成部分，明代则成为明王朝加强对西南地区统治的滇黔驿道。

从事文物保护单位多年的姜清刚出版了一本专写贵州古道的《黔路纪行——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田野调查笔记》，而他进入文保领域后和古道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在1985年的关索岭。从坝陵河峡谷的断桥沿石板铺就的古驿道爬上关索岭，作为一个曾经想当画家未果却从事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新人，姜清觉得“沿途所经，眼里和脑海里中无不是值得写生并且非常入画的景致。”

今天行走在这条长25公里，宽2至3米的古道上，山林苍翠，山风徐来，毛石砌筑的古道依山就势，一路蜿蜒，依旧风景宜人。关岭自治县文保局副局长胡林军是本地人，小时候生活在关索岭下，那时候古道上的人家已经搬走，空空的关索岭成了附近孩子的游乐场。每天孩子们的嬉戏之一，就是在古道上疯跑。跑过已成废墟的顺忠祠、高悬康熙御笔“滇黔锁钥”的御书楼、供奉关帝的双泉寺……以普通成年人的步履，徒步关索岭古道单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放在风一样的小孩那里，同样的时间估计已经跑了几十个来回。

胡林军带我们看古道上最深的一个马蹄印，嵌在弯道最外圈的石块上，已经成了一个微型蓄水池，一年到头大概也难有干燥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这里挖开古道保障重要用途，之后部分路段用水泥石块进行修补。和已经被数百年岁月盘出“包浆”的毛石相比，跟“愣头青”一样火气未退的水泥石块太难做到鱼目混珠，着实不是个好“卧底”。

自从20世纪20年代南京至昆明“滇黔公路”通车后，关索岭古道的功能就回归民间，仅供周边村民用于生产生活，并在老百姓的自发性保护中延续着生命。与“从前慢”的生活相连的古道，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生活中退至边缘，行人稀少，最后一户居民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搬走。自小在这条古道上玩耍，如今又做文保工作的胡林军大概最懂行走古道的乐趣：“你走的每一步，都可能和古人的脚印重叠。你摔了一跤，古人也有可能在那里摔过。”

关索岭这个名字里的关索，民间传说是关羽的儿子。而岭下的坝陵河，自古以来的名字是瀾陵河——和《三国志》中关羽“群曹挑袍”的河南许昌瀾陵桥的名字一样。与关索岭隔江相望的山岭名叫晒甲山，传说是关索随诸葛亮南征至此，露水过河时突遇暴雨，三军将士盔甲尽湿。于是趁雨过天晴，将士们返回山坡上晾晒盔甲，此山因而得名晒甲山。

传说扑朔迷离，埋在地名里的线索忽明忽暗。但当坝陵河回到其瀾陵河的前生，它就和西岸的关索岭、东岸的晒甲山，以及下游的孔明塘、孟获屯等等古老的地名一起，汇聚成了一条隐约的线索——如果它们因为彼此可能相同的身世，想建个微信群，群名大概就可以叫作“疑似三国遗珠一家亲”。

除了险峻地势和自然风物，关索岭古道上的几处残垣断壁，正是行走古道时令人流连的所在。门楼旁的明代顺忠祠，也叫武庙，以前人们还叫它铁枪庙，是祭拜关羽和关

索的，据胡林军说，清代还有“神武一家”的匾额；“马刨井”和“刀把井”近侧，立有双泉寺，和顺忠祠一样曾被毁。据说以前两泓泉水的附近有个亭子卖茶水，茶水是用泉水烧的，甘甜无比。古时的相送，很多都是到此止步，之后才是真正孑然一身的漫漫旅途。如今这里碎了一地的石头，曾见证了无数世间的悲欢离合。唯有双泉至今凉凉，四时不竭，最终汇入谷底滔滔坝陵河。

处于滇黔通道咽喉位置的关索岭，在元代开设“站赤”，明初辟为驿道前，就一直西南地区盐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之一。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发动“平滇之役”。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的30万大军，主力部队沿着元初修筑的“普安道”从湖南进入贵州，经思州（今黔东南州岑巩县）、贵阳、普定（今安顺市）、普安（今六盘水市盘州市），抵达曲靖，平息梁王叛乱。

平乱后，为了拥有一条长久安全、通畅的西南边陲通道，朱元璋下令对驿道进行重新修整。至明末时，贵州境内共有驿69处，站28处，递运所4处，共开设、修整驿道30余条，滇黔驿道即是5条主要对外交通干线之一。至清代，贵州其余道路均裁驿，改设递铺和塘汛，仅在滇黔驿道和湘黔驿道设立驿站，足见清廷对该道的重视。只不过驿道出今镇宁后在白水转今关岭被贡镇走郎岱，南走关索岭方向仍作为商道使用。

地势险要、位置特殊的关索岭，注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与关索岭



坝陵河大桥。（图片摘自《贵州桥梁志》）

一水相隔的晒甲山上，有和关索岭古道曾以老坝陵河桥一桥相接的鸡公背古道，也是滇黔驿道的一部分。军阀混战的1929年春天，时任贵州省主席的36岁的周西成率领黔军在此与李桑率领的滇军作战，战前还准备打到关岭吃午饭的周西城死于流弹。之后人们在鸡公背修建了他的衣冠冢，有石刻华表和六角石碑亭，碑文叙其生平。按照《关岭县志》的说法，后来“碑、亭、华表均被毁掉，拜台及墓家尚好，今墓石所剩无几。”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大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躲避战火和继续求学，从长沙辗转昆明，徒步经过关索岭古道。那时候的坝陵河老桥还没有成为如今的断桥，桥上甘蔗摊林立，多是水西苗族女子所设，对于来往关索岭的行人来说，此地有树有水，是顶好的休息场所。旅行团是走古道直接翻越关索岭的，抄近道者甚至走了一条比古驿道更难的小路，当地村民叫作陡坡，只有不负重时才可以走。从湖南一路过来，关索岭成为旅行团所经过的山中最难爬的一座。

坝陵河谷底的断桥，是一座命运多舛却也充满缺憾美的桥。300多年前徐霞客从这里经过，它是其《黔游日记》里的“关岭桥”。《永宁州志》里说它是通滇要道，“昔人建桥其上，不知创自何年。”又说桥上盘根错节生长着黄果树，“游人憩其下，往往流连而不忍去。”清道光年间，这座桥经历过倒塌和补修；二战期间，“史迪威公路”则经由这座桥，源源不断将国际援战物资运往抗日前线。直到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仓皇逃遁时将其炸毁，这座当地老人们口中的“老坝陵桥”，才变成了如今只剩东西两岸两个青石桥头的断桥。

站在坝陵河河谷，一眼就能同时望见坝陵桥的前世与今生。横穿世出的坝陵河大桥上除了南来北往的车，还不时有勇敢者挑战370米高的蹦极。在它之下的深谷里，断桥遍生荒草，欲言又止。它似乎被遗忘，却又与当地最有名的美食相连——断桥辣椒面、断桥青椒鱼。它把“坝陵桥”的大名让渡，却又以混沌的“断桥”之名，继续流连人间。